
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与民族精神

刘大年

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，讨论准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问题。这个事情抓得很及时。会议通知中列举的一些题目，我讲不出多少意见，只能就其中的两个问题简单说几句。

一 关于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

八年抗战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。这个根本转折，一是近百年间，中国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无不遭受失败，抗日战争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；二是八年抗战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。抗日战争爆发前，国家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蒋介石、国民党及其各派系手里。有蒋介石、国民党的参加，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战。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从实现，一时实现了也无法坚持下去。从这方面看，那些低估蒋介石、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说法，是不正确、不全面的。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以中国的胜利而结束，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力量的兴起是基本条件之一。这个基本条件的作用贯穿在抗战的全过程里。没有这个基本条件，全民族抗战就无从实现，蒋介石就只会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路上走下去；或者全民族抗战一时实现了，中国能否取得胜利，那是一个大问号。从这方面看，那些低估这个基本条件的说法同样是不正确、不全面的。回顾一下近代历史，就会明白这

一点。

抗日战争中，客观上存在着两个过程，两种演变。一个过程、一种演变是日本的力量由强变弱，由军事胜利推进到最后彻底失败；又一个过程、一种演变，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力量朝相反方向行走，人民力量空前强大起来。这两个过程、两种演变是紧密相连的。前一个演变关系中国亡国不亡国的问题，后一个演变关系今后将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的问题。谁在抗日战争中最出力，谁就在抗战以后更有力量，更有发言权，去领导缔造新中国。反过来也是一样。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，收复广大国土，得到人民拥护，力量大幅度上升；国民党由前期积极抗战，比较得人心，变为后期消极退守，保存实力，实行专制统治，日益丧失人心，政治影响衰落下去。抗战开始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只有三万多人，革命根据地只有一个 150 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。抗日战争胜利前夕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多达 100 万，民兵 200 万，抗日根据地北起长城内外，南至海南岛，人口多达一亿。以前共产党始终被国民党指为不合法，这以后才开始取得与前者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。抗日战争结束以后，人民解放战争很快取得胜利，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之诞生，不久，中国并踏上了社会主义发展前进的道路，归根到底就是由抗日战争这个历史的转折所造成的，是和那种政治力量对比的决定性改变分不开的。所以，要问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什么？我以为用一句话可以回答，那就是，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，抗战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，加速了新中国走进社会主义。也就是说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，是出自历史的选择。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谁也阻挡不了。蒋介石的 800 万军队没有阻挡得了，蒋介石和美国加起来也没有阻挡得了。新中国很快就要庆祝自己的 45 岁的生日。尽管经历过曲折，它至今取得的成就为举世所瞩目。这证明抗日战争所开辟出的道路是合理的，富有生命力的。纵观那段历史，人们将可以从本质上来认识现实，站在更高的位置上来分析现实中存在的问题，满怀信心去从事当前现代化事业的斗争。

用不着说,历史不等于现实,它也不可能这样那样为现实辩护。指出抗日战争开辟出了中国前进的大方向,丝毫也不意味着认为它就会像东西长安街那样可以笔直走下去。变化是事物的总规律,问题只在于如何变。

二 关于抗日战争所体现的中国民族精神是什么

对于这个问题,人们首先想到的回答是:中华民族传统悠久、根基深厚的爱国主义,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族压迫的精神。这个回答完全对,大家也都熟悉。我们最好能够找出更形象、更具体的说法来表述那种精神。在这里,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前辈们在抗日战争展开以后是怎么认识,怎么讲的。1938年7月,武汉举行群众大会纪念抗战一周年。国民参政会最年长的参政员,年愈古稀的老翰林张一麀致词。他说,“七·七”是最光荣的一天,比起双十节来更加光荣。希望大家加强团结,抗战到底,永远竖起一条脊梁。主持纪念大会的郭沫若把张一麀老人认为抗战是中国人的光荣,要永远竖起一条脊梁的话,作为民族典故写在自己的文章里。中国军民面对汹涌而来、猖狂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进攻,奋起抵抗,前仆后继,可歌可泣,这首先就是依靠他们敢于竖起自己的一条脊梁。无疑地,这正是抗日战争所体现的民族精神。有了这个伟大的精神,才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抗日战争中,中国人空前觉醒,他们强烈要求复兴中国,中华民族表现出了巨大的凝聚力;而这一切,都是由于绝大多数人敢于竖起自己的脊梁,积极行动,顽强斗争。谁都知道,并非无论什么中国人,一律竖起自己脊梁的。那些人中,有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纷纷出面充当日本傀儡的封建余孽;有国民党高层中叛国投敌的汪精卫一伙,以及国民党军几十名喊着“曲线救国”率部降日的将领。然而那些汉奸败类的出现,终究不过是伟大抗日洪流中一刹间就消散了的泡沫。抗日军民的光荣和竖起自己脊梁的民族精神却是永存的。前代的爱国者对这个问

题的认识,也应该是现代人以及我们的后来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。

中国今天处在最新的历史时期,现代化建设中每一样事情都是崭新的。竖起自己脊梁的民族精神是否意义减少了,需要重要评价了呢?我们的现实斗争的目标、环境条件与50年前根本不同了,无论从哪方面看,都不能认为抗日战争所表现的那种伟大民族精神、爱国主义可以丢掉,可以轻视了。今天不是改变对它的评价的问题,而是如何加以发展弘扬使它具有更广阔、更新含义的问题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,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并在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。其中有向前进的方面变的,也有向后退的方面变的。例如,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,美国在全球推行强权政治、霸权主义。在中美关系上,它把所谓遏制中国作为自己的任务,到处插手。美国某些言论媒体经常制造反华舆论。就在今年7—8月号的《未来学家》上刊有一篇叫做《世界领导权》的文章,鼓吹创立“大国协作组织”,由美国充当领导,把中国排除在大国组织外面。在那家杂志主持者的眼睛里,中国在亚洲、在世界似乎并不是有合法权利的国家;中国居世界第一位的人口,它的武装力量和经济成果,都是不算数的。又例如,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,民主力量增强,广大群众、广大知识分子不会容忍战前军国主义的统治再现。和平发展是日本的主流。然而,日本政界一些人给日本侵略中国翻案的喧嚷,越来越频繁,越来越嚣张。他们不满足于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,要求重新成为军事大国。他们以前的翻案还只是在历史教科书上把“侵略”改为“进入”之类,现在则扬言日本侵略中国、侵略亚洲邻国不但无罪,而是有功,而且是有大功。这个大功,一是把亚洲国家从英美统治下“解放出来”;二是亚洲国家今天的经济发展,应该“归功于战争”,即归功于日本的侵略、统治。对此我想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加以评判。前些天,《朝日新闻》的一篇社论上说,从1986年以来,日本政府因“战争责任发言”而更换阁僚,到现最近撤换环境厅长官樱井,已经是第四次了,不知今后还要重复多少次。那么狂言者屡次因所谓“战争责任发言”,而不得被迫下台,这说明什

么?这说明今天的中国和亚洲确实是一个新中国、新亚洲了。它们岿然屹立在那里,谁要任意颠倒历史再也难以办到了。问题在于,日本政界某些人所以要屡次跳出来重复那些谎言,是他们的话有听众,有人督促他们讲。他们讲了,能够在那些人中博得喝彩,抬高身价,以至猎得权位。这就是说,他们的话是反映了潜在的军国主义势力的动向,反映了日本社会中总有那么一股势力,那么一批人,盼望有朝一日重温“皇军赫赫战果”的旧梦。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不可对此置之不理。

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,要与世界广泛交往,要办外交,要做生意,要让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,要进行思想、文化、学术交流,要认识、了解世界多种多样的事物,并对那些事物有所评价。这不是少数人的事,是大家的事,至少是很多人的事。但不论进行哪种交往、交流、评价,我们都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,不可缺少民族精神。这个精神是什么,显然应该就是抗日战争所体现的、并因此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的竖起一条脊梁的精神。这就是在面对霸权主义威胁干涉,有可能丧失民族尊严、国家权益的时候;在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潜在势力的挑战,须当回应的时候;在外来势力的政治蛊惑、物质引诱下,可能自辱于炎黄子孙的时候,以及其他情况下,发生人格国格问题的时候;在所有这些时候,我们需要坚持一条:竖起自己的脊梁,保持民族光荣。抗日战争所体现的这种民族精神是不会过时的——至少在可以想像的未来是这样。

(1994年8月24日于北京房山十渡)

(作者单位: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)